

情之嬗变

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

陈瑜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情之嬗变

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
翻译与改写

陈瑜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之嬗变：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 / 陈瑜著.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5668 - 1559 - 0

I. ①情… II. ①陈… III. ①《茶花女》—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565. 074②H3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9608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27 千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的出版获“广东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类）”（项目编号：2014WQNCX028）及“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13SK15）资助。

作者简介：陈瑜，女，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浪漫爱”的现代启蒙：清末民初的《茶花女》与中国	/ 1
一、	《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	/ 1
二、	《茶花女》与清末民初中国人情感观念的演变略述	/ 8
三、	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翻译与改写研究的范围及对象	/ 14
四、	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翻译和改写作品国内外研究综述	/ 18
五、	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和改写研究理论、方法及框架	/ 37
第一章	曲译“忠贞”：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 54
一、	吊诡的“贞洁”	/ 57
二、	性贞与情贞	/ 64
三、	危险的“茶花”	/ 71
四、	忠贞的“摆动”	/ 82
第二章	言情的“政治化”改造：钟心青的《新茶花》分析	/ 95
一、	移植“茶花女”	/ 96
二、	新妓女、新男子与“新”爱情观	/ 102
三、	从家庭到政治	/ 108
第三章	戏曲改良、“茶花女英雄”与“家国爱情”：时事新戏《二十世纪新茶花》研究	/ 114
一、	清末舞台上的“茶花女”	/ 116

情之嬗变：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

二、《二十世纪新茶花》的“改良”始末 / 122

三、从妓女到“英雄” / 132

四、“爱情+革命” / 140

第四章 “女英雄”的世俗化：戏情小说与福州评话《新茶花》 / 144

一、“新茶花”的生活化 / 147

二、修正英雄形象 / 153

三、女英雄的世俗化 / 159

第五章 “内在”的爱：《玉梨魂》对《茶花女》的模仿 / 164

一、矛盾内在化 / 168

二、知己之恋 / 175

三、“内聚焦式”抒情 / 182

四、“自我”的爱 / 188

结 语 / 198

附录一 / 205

附录二 / 207

附录三 / 222

参考文献 / 224

后 记 / 231

绪 论

“浪漫爱”的现代启蒙： 清末民初的《茶花女》与中国

《茶花女》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影响最大的艺术译介作品之一。中国清末第一部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小说、中国人最早尝试的欧式话剧演出作品以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演唱的西洋歌剧无一例外都是《茶花女》。这部作品不仅镌刻着中国人在小说、话剧、歌剧甚至电影等艺术领域开拓的足迹，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西方以“浪漫爱”为标志的现代情感观念的接受与启蒙，开启并引领了中国言情传统的现代变革。

一、《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与改写

《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是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于 1848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它讲述的是巴黎名妓玛格丽特和青年阿尔芒的浪漫爱情故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青年阿尔芒爱上了巴黎名妓玛格丽特，可他们的爱情受到阿尔芒父亲的阻挠。阿尔芒的父亲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劝说玛格丽特，让她为阿尔芒的前程和阿尔芒妹妹的婚约着想，放弃这段感情。玛格丽特接受了他的请求，制造了变心假象，让阿尔芒怀着怨恨离开了她。玛格丽特选择了自我牺牲，但同时也经历着内心的煎熬，积郁成疾而离世。阿尔芒后来发现真相，但一切已无法挽回。

这部小说广为流传，并不断被改写。1852 年，小仲马将它改编成话剧；1853 年，意大利歌剧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 将其

改编为歌剧；1909年，丹麦人将其改编为电影。其后，还有人将之改成芭蕾舞剧、卡通和连环漫画^①。它的译作也层出不穷：1856年，《茶花女》的英文译本问世；1859年，西班牙语译本进入市场，之后还有俄语、德语、匈牙利语等译本^②。这些翻译延续了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正如小仲马本人所言：“《茶花女》的故事将会在全球不停地重演，哪里有妓女和青年男子，哪里就有它。”^③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将《茶花女》看作是“神话”，他说“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表演《茶花女》……这个成功提醒我们要注意‘爱’的神话”^④。

这个“‘爱’的神话”，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首先，《茶花女》在中国近代文艺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在清末民初的文人看来，它是“西土说部入华之第一策”^⑤，它树立了西方文学在中国文人眼中的新印象，很多人是因为《茶花女》才开始了解外国文学的。民国时期的评论者寒光认为：“自林氏和晓斋主人（笔者注：王寿昌）同译了《茶花女》以后，中国的小说界才放大眼光，才打破了从前许多传统的旧观念和旧习惯；并且引动了国人看得起外国的文学和提高小说家的身价；中国文学界也因此开展了文学的世界眼光来迎接国外新的思潮。”^⑥1899年，林纾和王寿昌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小

① 以上艺术类型的作品出版（发行）情况，见 David Coward.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La Dame aux Camélias*. Written by Alexandre Dumas, fil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VI - IX.

② 《茶花女》是法国19世纪中叶最为流行的小说和话剧之一，是意大利歌剧家朱塞佩·威尔第的代表作（1853），1909年丹麦人制作了第一部“茶花女”电影。在所有的电影版本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导演乔治·库克（George Cukor）1936年出品的《茶花女》（*Camille*），该片由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和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主演，嘉宝饰演的茶花女形象一度成为观众脑海里“茶花女”小说原型的最佳替代。

③ 该话的英文译文为：“It will always be replayed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rever there are courtesans and young men”，见 Alexandre Dumas, fils. *La Dame aux Camélias*. Trans. David Cowar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IX.

④ [法]罗兰·巴特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的诠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⑤ 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卷三，第40页。转引自蔡祝青：《译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国阅读视域下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辅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62页。

⑥ 寒光：《林琴南》，北京：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98~199页。

说。1907年，李叔同等人在日本东京公演了《茶花女》选幕，这是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出。可以说，《茶花女》在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现代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其次，《茶花女》译入中国后，其受欢迎程度和不断被模仿的事实，使它已经不再是一部简单的文学作品，而是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近代诗人陈衍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①不少人在文学创作或现实生活中，都以模仿“茶花女”为荣。晚清著名翻译家严复有诗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②，这是对《茶花女》影响的生动描绘。

从晚清起，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时时可以见到“茶花女”的身影。1903年，曾朴的《孽海花》中，浪子骧东为其英国情妇玛德的隐忍离去哀叹，他说：“英国女子，性质大半高傲，玛德何尝是个好打发的人。这回的忽然隐忍退让，真出我的意料之外，但决不是她的怯懦。她不惜破坏了自己来成全我，这完全受了小仲马《茶花女》剧本的影响。想起来，不但我把爱情误了她，还中了我文学的毒哩。”^③在周瘦鹃的小说《花开花落》中，女主人公自杀前吟诗道：“少小嗜说部，腹中知几许，一笑掷郎杯，同看《茶花女》。”^④庐隐的《象牙戒指》女主角沁珠在爱情困顿、难以为继时，便想起“茶花女”^⑤。1938年，“海派倡门压卷之作”——《亭子间嫂嫂》（周天籁著）中女主角顾秀珍站街拉嫖客，手中的道具就是一本《茶花女》^⑥。《茶花女》俨然成为“爱的行为指南”。不只文学中的虚拟人物，现实中的青年男女也以“茶花女”为楷模。20世纪20年代，南国社的女演员黄白英，誓言追随“茶花女”的脚步，要按“茶花女”的方式来处置自己的生活和爱

① 陈衍：《林纾传》，见《福州通志·文苑传》第9卷第26页。转引自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

②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转引自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③ 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307页。

④ 转引自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⑤ 庐隐：《象牙戒指》，集于《庐隐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⑥ 范伯群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情，她因此被封为“中国的茶花女”。为此，田汉还公开写下了《给一个茶花女的信》，用于劝说，在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899年林纾和王寿昌翻译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迄今，《茶花女》在中国的译本有近两百种。文类包括小说、歌剧和话剧。其中，以小说的翻译最多。根据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及《茶花女》中国翻译和改写作品的出版情况^①，《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和改写活动可分成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即1899年至1918年。这一时期横跨清末到五四以前，译作和改写作品形式丰富，故事内容与时代话题密切相关，屡屡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为《茶花女》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1923年至1939年。这个时期属于五四退潮、左翼文学兴起及抗日战争爆发前期，这一时期的《茶花女》文本都是译作，几乎没有改写作品。这时的译者与林纾相比，更为专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出版了国人自己翻译的《茶花女》英译本。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改写的《茶花女》话剧和威尔第的《茶花女》歌剧，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且都被译成中文出版。

第三个时期是1946年至1948年。1939年到1946年，由于国内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茶花女》作品的译介和出版活动相对停滞。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茶花女》的译本重新出版印行。

第四个时期是1955年至1959年。1955年后，新中国文学和文化事业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作为外国经典名作的《茶花女》开始得到新中国艺术家们的关注，虽然这个时期的译本不多，但可喜的是，《茶花女》歌剧迎来了新发展。

第五个时期是1979年后至今。从1959年到1979年的整整二十年，我们很难找到《茶花女》的正式出版物；直到1979年，陈林和文光重译了《茶花女》，这部西方名作才得以“重见天日”，使《茶花女》的翻译和改写活动在改革开放、重塑西方经典的热潮中勃兴。

^① 具体出版情况，详见本书“附录二”笔者收集的“1899—1999百年间《茶花女》在中国的出版信息概览”。

将上述五个不同时期的中国版《茶花女》文本相比较会发现，清末民初的《茶花女》翻译和改写活动最为独特；而且，相比其他时期而言，翻译和改写的各类“茶花女”故事，内容最为丰富。首先，清末民初的“翻译”，更准确来说，其实是对作品的一种“跨文化的改造”。这时发生的翻译现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字词对译，它至少包括了“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①。而且，这一时期的文人不仅翻译《茶花女》，还用中国故事改写《茶花女》，创造了本土化的“新茶花”。其次，清末民初《茶花女》改写本的形式十分多样，不仅有小说故事，还有戏剧、评话等。最后，这一时期的《茶花女》改写本，故事内容新奇多样。有译者将它写成是两性“忠贞”的教本，又有改写者将这段爱情置换成“救国女英雄”传说，还有作家移花接木，衍生出“寡妇恋爱”的故事。

形成这样复杂的翻译和改写状况，除去作者的主观因素外，有两个客观原因必须考虑在内：一方面是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热衷于学习西方文学、文化，他们希望通过小说翻译来引进新式文明，改革社会，因而这一时期出现了翻译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文学、文化的认识还很有限，因此，也有这种情形发生，即人们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来诠释作品，由此产生的新“茶花女故事”也别出心裁，显得独具一格。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有着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这些也造成了这一时期《茶花女》翻译和改写文本的多样性。按梁启超描述，“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旧嬗代之时也”^②。这一时期的改写本，既呈现了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又描绘了社会新事物、新观念的流行，如人们对西方礼仪和文明的学习、对自由恋爱等现代观念的接受

① [美]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梁启超：《本馆第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清议报》，第100期。转引自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等。新旧时代交替的特点会聚其中，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茶花女》的翻译和改写文本特别有助于我们从中解析那段历史的丰富情态。

《茶花女》的主题是爱情，情感描写和由此引发的共鸣是“茶花女”故事长盛不衰的要素。就此而言，20 世纪初期中国人对《茶花女》的翻译和改写，也始终是围绕着情感主题来展开的。然而，却较少有人系统地考究过以下问题：清末民初《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和改写文本，它们所传达的爱情观念与原作相比，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从哪种程度上回应甚至推动了社会的转型？

谈到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多半关注的是文学、文化传统或社会体制的变革，很少有人将情感观念转变看作社会转型的重要面向。当我们对比五四前后中国人对情感的认识和表达，就可发现，传统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理念，似乎一夜间被“自由恋爱”和“浪漫情感”所取代。这之间到底经历了怎样复杂的演变过程？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清末民初，大量译入的西方言情小说也在逐步改变人们对情感问题的认识。由此，要想对晚清到五四时期情感观念的演变有所了解，这一时期的《茶花女》在中国的翻译和改写文本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个案。做出此论断原因有二。

其一，林纾和王寿昌 1899 年翻译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第一部在中国引起轰动的西方言情小说，它可说是最早且最形象地将西方“浪漫爱”模式传入中国的作品，在这部作品身上，西方的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情教”（the cult of qing）得到了最直接的融合。它为中国言情小说的写作开启了以“哀情”和“浪漫”为主要元素的新的书写格局。按陈建华所言：“夏志清先生就把林译《茶花女》看作中国源远流长的‘言情文学’的接绪。更确切地说，起始于《茶花女》的林译言情小说，不仅促成了这一文类的现代兴起，并促成了它的现代转换。”^① 美国学者李欧梵更在其《情感的旅程》一文中将中国版《茶花

^① 陈建华：《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5 页。

女》文本的两位重要改写者列为在情感表达方面“反传统”的先驱。他提出，在儒家传统一味用“理”来驯服“情”的一般背景下，“林纾和苏曼殊用不同的方法去确定情感的中心地位，并宣布出现了以情感为根据的典型个性。情感作为存在的中心模式的普及，见于林纾、苏曼殊同时代的人，即那些在条约口岸的报人和文人。这些人在给大众阅读小说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受儒家、佛教和中西元素影响的情感世界”^①。

其二，还应考虑的是，五四时期高举“浪漫爱情”旗帜的众多作家，都直接受到林译《茶花女》及其他作品的影响，比如郭沫若，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就曾提到，林纾翻译的三部外国作品在他年轻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茶花女》极有可能是不少五四青年接触现代情感理念的启蒙之作。这也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作品中，不断提及“茶花女”来回应这种影响。比如庐隐的《海滨故人》女主角露莎在书房看书，看的是《茶花女遗事》^②。此外，《象牙戒指》女主人公沁珠却“喜欢像茶花女——马格哩脱那样处置她的生命”^③。

从上可见，清末民初的《茶花女》文本已成为中国近现代言情文化变迁的一面不可多得的透视镜。对此进行考察，不单可以勾勒出中国言情文化变迁的轨迹，展现隐藏在情感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运作，还可以从“情感”的维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十分有必要对这一时期中国人情感观念的变迁和言情书写做一回顾，这是因为，当情感超乎寻常地成为重要主题，不仅关乎时代和社会，而且激发起知识分子群普遍的讨论时，《茶花女》这个文本才会获得翻译和流行的契机。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4页。

② 庐隐：《海滨故人》，集于凡尼、郁苇选编：《庐隐作品精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③ 庐隐：《象牙戒指》，集于《庐隐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二、《茶花女》与清末民初中国人情感观念的演变略述

“情感”，顾名思义，指的是人的情绪感受，但在笔者看来，它并非仅仅与心理情绪有关，它还关涉文学创作、个体与社会关系、个人的主体性建构等，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文化概念。学者李海燕（Haiyan Lee）提出，在现实社会，情感是个体与他人关系维持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成员等级秩序形成的重要依据^①。此外，个人的主体存在离不开情感。我们一般都认同，“人是情感的存在”^②，但正如蒙培元所指出的，情感还有更重要的性质：“对人而言，情感具有直接性、内在性和首要性，也就是最初的原始性。正因为如此，情感就成为人的存在的重要标志，并且对人的各种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甚至起决定性作用。”^③

情感观念，简单讲，指的是人们对情感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有关情感的论述源远流长。先秦诸子百家常将“情”与“性”相提并论，《荀子·正名》提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④在情感的表现上，他们主张用“礼义”来节制情感，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⑤。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学士肯定“情”是人的本性，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⑥。到晚明，汤显祖的《牡丹亭》宣扬了超越生死、愤极决裂的“至情”，而冯梦龙的“情教”则把男女之情推演为一种源于生命、发乎天地万物之

① Haiyan Lee.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 - 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7. p. 2.

②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

④ 徐刚：《情为何“物”》，集于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⑤ 原句出自《诗大序》，用以描述“变风”“变雅”的写作：“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后人引申指人们的情感行为要有所节制，要遵循礼义的规范要求。

⑥ 转引自何善蒙：《魏晋情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间的感情，他提出：“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①

这些论述虽然各有不同主张，总体来看，它们都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核心，用学者何善蒙的话来说，“儒家对于情感的强调，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道德教化的功能”^②。直到清末民初，这一状况才始有较大的变化。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所说：“在个人微妙的、内在的情感层面上，中国传统价值模式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③在这一时期的情感论述中，礼教的价值核心受到挑战，一种现代的、强调自我和个性的爱情观念逐渐酝酿、生成。

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中国人情感观念的演变，李欧梵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就进行过梳理。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一书中，他以“情感的旅程”为题，描绘了这一时期中国作家对情感的认识，还分析了他们的抒情作品。在李欧梵看来，中国人的情感传统源远流长，可对儒家来说，必须发乎“情”，止乎“礼”。这虽说是一个经典律例，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反传统”的文学作品。李欧梵认为，林纾和苏曼殊就是两位承担此历史重任的先驱。因为他们用了不同的方法去确定情感的中心位置，“林纾致力辩明而苏曼殊致力体现的重要一点是：要有正面的价值，主观表现的个人情感应该是真实的”^④。

李欧梵在这里就论及林纾翻译《茶花女》的现象：“当林纾据说为了外国‘茶花女’而流泪时^⑤，他已经远远超越儒教束缚而达到另一个境界：只要是真心表达的个人情感，不论是否反映中国社会确立的道德

①（明）冯梦龙：《情史·序》，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何善蒙：《魏晋情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③ Mark Elvin. “In What Sense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of a ‘Modernization’ of the Emo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集于《中国现代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07页。

④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⑤ 林纾曾在《〈露漱格兰小传〉序》中记载过，他翻译《茶花女》时曾数度大哭：“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见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1901），集于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8页）

规范，都可以是一个人主要的世界观。通过为自己的道德寻求情感的基础，并用道德观使自己的情感合理化，是林纾在这过渡时期作出的贡献。”^①而且，就文学创作而言，晚清文学里已经存在突出作者个性的主观倾向。这一点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发展，李欧梵提出，五四运动使个人情感的堤坝崩决，作家的创作多以“自我揭示”为风尚，作家内心最深处的感情和性欲秘密也因此得以揭示。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充满对爱情的歌颂，它“说明了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更巨大的现象：五四运动不仅激发了文学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也推动了情感上的革命”^②。李欧梵提出，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爱情行为，我们可以看到，“爱情成为新道德的总体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传统社会精神特质的礼教，且把礼教等同于外在的限制。在解放的一大趋势中，爱情与自由等同；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爱情和释放自己的热情与精力，个人可以真正成为既完全又自由的人”^③。

李欧梵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转折期的作家的情感表达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从他对林纾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中国人情感观念的演变历程中，《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在破除情感的传统禁锢方面发挥了“先驱”的作用。但李欧梵的研究多半集中于文学创作领域，而未对这一时期的观念形态做更系统的阐述。

进入21世纪，跨学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学者李海燕在2007年出版了《心的革命：中国的爱情谱系（1900—1950）》（*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一书，是当前有关情感的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是这一阶段情感问题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该书讨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情感观念演变，其中对晚清至五四前后这段时期有专章论述。李海燕指出，从清末民初（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十年）到五四，再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情感论述（discourse of senti-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② 同上，第267页。

③ 同上，第268页。